



陈云
戴安仁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革命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危难之际出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率领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在保卫党中央安全和获取情报等方面立下了卓著功绩。

危难之际，26岁重建中央特科

1931年4月，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了很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危急。

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临时中央机关36名共产党人被捕。危机再次袭来，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难继续生存……

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并提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危难之际，年仅26岁的陈云挑起了重担，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

如何使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尽快摆脱叛徒带来的打击，迅速开辟中央特科新的工作局面，成为了摆在陈云面前的首要难题。他与潘汉年等同志一起，短时间内从观念、组织、制度、方式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使得党的隐蔽战线迅速打开新局面。

精简特科，重点突出政治保卫

顾顺章叛变后，大部分特科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心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斗争，少部分投机分子则偷偷做起了叛变投



李克农
戴安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李克农上将似乎是其中的“另类”，终其军旅生涯，始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掌管过一兵一卒。而他作为隐蔽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以“无形”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一场场“有形”的战争。

沉默的军队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情报战略机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参与到了中共情报工作由警报性、保卫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的工作中。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针和做法：

以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心，以获取有关中央决定战略的情报为目的。具体地说，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等主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

不仅要获取机密的战略性情报，而且要周密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把公开的调查研究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起来。

要注意广泛利用广大社会人士的关系，加强上层情报联络工作，把上层情报联络工作与内线工作结合起来。

此外，中央情报部与负责内部审查保卫的中央社会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因此，李克农长期领导我党反间谍、锄奸、肃特相关工作。

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是我党情报部门建设历程中的重要标志，也是如今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这支

陈云：

危难之际撑大局

敌的密谋。形势十分危急。

“冷静，沉着”的陈云迅速调整思维，他指出，“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中央特科现在的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

在陈云的带领下，中央特科的工作逐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同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陈云调整内部组织，将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再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调离；同时撤销第四科（原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3个科进行精简缩编。

单线联系，变化多端

为了汲取顾顺章、向忠发等的教训，陈云要求特科改变原有的活动方式，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间的往来。

如规定“每个人的住所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更换。”他还要求特科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社会关系掩护特科工作。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摧毁了特科历经艰辛搭建的情报网，也让敌人对我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情报工作重建上加难。在陈云的领导下，特科一方面继续坚持“打进去”和“拉出来”，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重新建立起情报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开创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积极同上海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士广建联系（如董健吾、杨度等），为我党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假自首”打入敌人内部

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央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并报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同时决定，如果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而无法掩盖身份的，在不帮助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政策。

事实证明，“假自首”有力瓦解了敌人的自首政策。一方面，开辟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使他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了信任，将其秘密处死。陈云等人还经过秘密策划，对敌人的特务首脑和特科的叛徒进行了公开刺杀，这大大打击了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队伍士气，也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外，陈云带领特科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对瞿秋

李克农：

上将胸中百万兵

“沉默的军队”，一直为党中央承担着隐蔽战线配合公开战场的职能。

从侦察兵到领军人

李克农之所以能出任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人，与他此前成功“潜伏虎穴”和长期建设党的情报队伍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之下，一支“侦察兵”秘密潜伏进入了“作战位置”。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这一决定基于共产党的中央的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4月25日，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直接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

此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李克农回到中央苏区，在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主要负责肃清间谍、保卫中央，以及大战役后高级军官俘虏的审查处理工作。中央红军组建红军政治保卫局后，他担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后又在红军保卫局改组的红军工作部担任部长。在长征中，李克农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他和红军情报队负责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研究最新情报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而对于李克农本人而言，他也完成了从“孤身潜伏”，到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情报队伍的“隐蔽长征”。

十万军情系一纸

欧美几大著名情报机构，以暗杀、色诱、渗透破坏为能，甚至在银幕上极力夸耀自己的特工形象，但我党的隐蔽战线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他们有根本的不同。

对于我党隐蔽战线而言，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为我所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同志。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条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尧、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孙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中共的优秀党员。

在这张情报网的基础上，李克农领导隐蔽战线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白、牛兰夫妇的转移和营救等保卫任务。

大模大样开铺子做假老板

经过艰辛的重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的中央特科恢复了元气，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顽强与敌人巧妙周旋。这期间，陈云还有一段开铺子做买卖，当“掌柜”的特殊经历。

为了更好地掩护特科，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20多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陈云本人的办事机关隐蔽在上海山海关路一个名为“新生”的印刷所内。他“借”了一间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位青年工友（特科人员李士英）和几个学徒，就“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就这样，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地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陈云后来说，他的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则在回忆录中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产党内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茫然无知。”

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的亲自主持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察局旁，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显著。”

1932年3月，上海爆发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中央决定让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离开特科领导岗位，陈云开始了领导工运的新的革命历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世保 王吉胜《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

[2]《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百年潮》2013（11）

[3]于英丽《陈云与中央特科》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5（9）

[4]保密观《追忆陈云：顾顺章叛变后，在上海“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2020年4月10日

[5]张伊丽《解密：陈云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前前后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年7月20日

[6]王洪 陈宗良《忠诚与信仰—西柏坡无名英雄碑碑展覧人物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潘汉年

1946年8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令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谢士炎将作战计划拟好后，先通过联系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叶剑英和李克农，随信送到的还有谢士炎自拟的反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经周恩来批准之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刻根据这份重要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有效阻止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阴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都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华中、重庆、西安甚至上海和香港都以类似的方法建立了稳固的情报据点和组织。这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共获取和及时传递重要战略情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兵不血刃揽民心

在李克农领导下，我党情报队伍历来重视通过做“人心”工作争取各派人士为我党所用。“统一战线”的诞生，就与我党情报队伍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红军胜利会师陕北之际，我党就开始着手争取张学良。李克农为此前俘虏的东北军团级军官高福源“量身定做”了一部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使其主动向张学良传递中共立场的信息。后李克农亲自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成功敲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主持了对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接洽工作，通过斯诺等人，成功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声音，为争取国际合作和援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通过王玉、阎又文等情报干部成功对傅作义施加了极大影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渡江战役前，中央情报部更是在李克农领导下，接连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次起义，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又在外事谈判上作出了极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李克农受党中央委派入朝，全权领导对美谈判。李克农利用谈判技巧和多年军事政治情报经验，幕后指挥中朝代表团挫败了美方多个阴谋，达成停战协议，捍卫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

回顾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李克农总结道：“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中共党史出版社



陈赓
戴安仁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陈赓受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谍海秘战波诡云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实履行保卫党中央特别是中央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蔽斗争传奇经历，为陈赓波澜壮阔、辉煌精彩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拜托陈赓抓陈赓

1928年4月，经党组织考察选派，陈赓化名“王庸”，担任刚组建不久的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通过专门培训，除精通基本工作技能外，陈赓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扮什么像什么，穿什么像什么。

由于个性风趣亲和，交友广泛，“王庸”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等部门人员、巡捕房的耳目，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不论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的场所，还是外国租界巡捕房，必要时陈赓都能随时进出。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现场，情况异常紧急。为掩护同志们转移，陈赓灵机一动，同前来围捕的警察“合作”充当“蟹脚”，独自把守出口，悄悄将这些党员放走。



潘汉年

“小开”意思类似“富二代”，源于老上海话，专指那些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仗着老爸或老家的财势过日子的富家子弟。在我党隐蔽战线史上，也有这么一位被毛泽东亲切地称呼为“小开”的同志，他就是红色传奇人物——潘汉年。

如此称呼潘汉年并非他是富家子弟，而是因为他常年带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举止儒雅，风度翩翩。就是这样一位“小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获取向忠发叛变口供

1931年初，年仅25岁、刚刚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一项命令，要他紧急赶往上海。原来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特科，接替陈赓，开展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此，潘汉年与隐蔽战线结缘，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

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潘汉年积极参与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转移，迅速开展对内部的清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顾顺章叛变影响的清理。原来，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发现，顾顺章的家属仍与其保持联系，明里暗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中央特科及时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

潘汉年还用极大的精力将已经失去功能的情报网点恢复和组建起来，开辟了更多的情报来源，形成了情报工作有名的“潘汉年系统”。华克之、关露、黄慕兰等令后人无比敬佩的红色特工，都是他的部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投敌的真相就是通过潘汉年的情报网点搜集到的。向忠发因擅自外出被捕，党中央多次组织营救，均告失败。就在党内大多数人误以为其已被国民党秘密枪决、要为其举行追悼纪念活动的时候，潘汉年却获得了新情报。原来，向忠发在党中央营救之前就已经叛变投敌了，他不仅供出了任弼时夫人的住所和中央秘书处机关，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的秘密

陈赓：

旋舞刀尖斗敌顽

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政治部的洋探长兰普逊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答应。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眼前，还配合他们上演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龙潭三杰”建奇功

根据党中央指示“选派极少数同志到国民党部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破坏工作”的要求，1929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三人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组织关系也由地方支部转到陈赓手中。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化名“黎明”，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而被捕。顾顺章并未受到刑讯逼供。他主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并要求面见蒋介石。求功心切的侦缉处长蔡孟坚连续给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发去6封绝密电报，全部标明“徐恩曾亲译”。

当时班底的恰好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利用偷拍的密码本将绝密电报破译出来，十分震惊。电文主要内容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已投降，如能迅速转到南京，三日内可将中共机关全部肃清。顾顺章供称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有共产党员潜伏。钱壮飞深感事态十分严重，立即将情报报告给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向陈赓和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惨重的灾难。

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了上海几十处中共秘密机关，结果一无所获。安全撤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聂荣臻、邓小平、陈云、陈赓……“龙潭三杰”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三把尖刀，在情报战线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

参考资料：

1.情报科长“王庸”——陈赓《隐蔽战线忆周恩来》

2.“隐蔽战线英雄谱”特别策划《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

3.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2期

潘汉年：

与狼共舞建奇勋

住所。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潘汉年通过内线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经周恩来审阅，确认叛变投敌。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这些可靠的情报有效地保护了中央领导机关和许多同志。

暗杀首恶分子王斌

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中央保卫机关决定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鼓舞士气。任务下达之后，潘汉年就开始认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暗杀对象。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逮捕共党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如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中央特科决定拿王斌开刀。

不过，令潘汉年大伤脑筋的是，党的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系的任何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汉年看到一条查禁书刊的新闻。细心的他立即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人相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对某些书刊的查禁，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宴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有关人员。

果不其然，张、沈两人不仅认识王斌，还知道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潘汉年又侦查到王斌每天乘坐黄包车从其住宅后门出入。最后，确定将南通法租界、北连公共租界的龙门路作为暗杀场所，这也是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来人，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

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探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感到极度恐慌，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突然逮捕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两位同志。这次事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将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日方内部设抗日情报据点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上海成为一片混乱之地，各方势力都想在上海占有一个“席位”。此时，潘汉年又奉命回到了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闻路经院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打牌”的几个人全部押走。白鑫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在麻将桌四周开会的人，分别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以及白鑫。

陈赓通过“王牌内线”杨登瀛很快查明，出卖党的领导干部的叛徒就是“黄皮白心”的白鑫。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企图在中共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的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倒向国民党的投名状，并获取一笔丰厚的赏费。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决不能让白鑫溜掉。在弄清其具体藏身住址和出逃时间后，中央特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周围布下一张大网，数名“红队”队员装扮成补鞋匠和小商贩，守住弄堂到霞飞路的出口。陈赓租住在紧邻范公公馆的27号3楼，严密监视白鑫的举动。周恩来亲自到现场观察，确定在白鑫动手那天将其处决的行动计划。

11月11日23点，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终于在和合坊43号后门口出现。他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市警察局侦缉队督察员范争波及保镖簇拥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码头的汽车。陈赓率领“红队”队员一拥而上，数枪齐发。白鑫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拔枪抵抗，一边夺路逃命。陈赓等人紧跟不舍，终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在71号门牌前。

上海滩报业对霞飞路锄奸行动大肆渲染，《申报》称此为“暗杀巨案”，外交报纸使用套红标题《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把枪战描绘画得有声有色。上海租界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颤胆寒。

参考资料：

1.情报科长“王庸”——陈赓《隐蔽战线忆周恩来》

2.“隐蔽战线英雄谱”特别策划《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

3.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2期

潘汉年：

与狼共舞建奇勋

上海，他的使命是获取日伪的情报。潘汉年的公文包里总放着一瓶汽油与一包火柴。他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随身的公文包里，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他就会点燃这些重要情报，防止泄露。

此时，党中央对于潘汉年工作的具体指令是要他获取国际局势的战略情报，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又格外艰难。

潘汉年想到了一个人。1935年，潘汉年派袁殊打入国民政府内部获取情报，但不小心暴露被捕。当时，袁殊得到了同学岩井英一的搭救。岩井英一是日方特务机关的头头人。袁殊出狱后，国民党军统也看到了袁殊的利用价值，又派人联系袁殊，希望他能够提供情报提供日方情报。由此，袁殊与多方有了合作。

在袁殊的促成下，潘汉年与岩井英一见面了。双方交谈中，潘汉年称自己是中间派的民主人士，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岩井英一对潘汉年进行了多方的试探，都被潘汉年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岩井英一放下了戒心。岩井英一答应了潘汉年的提议，那就是双方互换情报。

抗战时期，与日方私下交易情报，这不是通敌叛国吗？其实，潘汉年提供给岩井英一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消息。这些消息对我方无关系要，但对日方来说，他们是没办法接触到的。所以，在日方的眼里，这些情报相当的重要。凭借潘汉年的这些情报，岩井英一得到了重用，此后他更加依赖潘汉年的情报。

反观潘汉年，他从日方获得的情报都是重要的机密情报，还有很多是国际性的情报。其中就有西方国家妄图牺牲中国向日本妥协及国民政府私下里与日方接触等情报。这些情报的及时传递，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效地维护了抗战统一战线。

岩井英一所领导的情报机构在上海有4个部门。在潘汉年和袁殊的努力下，我方牢牢掌握了其中3个部门的相关情报。潘汉年能够把我党的抗日情报据点放在日方的情报据点内，这是情报史上的奇迹。

潘汉年作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战士，抗战时期的红色特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人民网

2.学习强国

3.《潘汉年传》张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默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